

# 談復原力與文化復原力觀點 對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之啟發

吳書昀

## 壹、前言

復原力是「在逆境中仍能恢復功能並正向適應的動態歷程」，由於此觀點強調兩種調適：一是儘管有威脅或危險存在，仍能維持正常發展；另一則是由創傷中復元（Staudinger, Marsiske, & Baltes, 1993，引自宋麗玉，2005：13），因此時常被應用在兒少保護工作或家庭處遇服務中。雖然如此，當兒少進入保護體系後，後續的家庭處遇或家外安置之安排還是造成許多原住民族兒少與其原有的文化斷裂（Cornwall, 2004; 林津如、黃薇靜，2010）。在這樣的反思下，一種從文化層面來理解復原力的觀點應運而生。文化復原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協助個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良好適應與和諧融洽的過程」（Clauss-Ehlers, 2004），在納入了文化多樣性之

後，可跳脫以往「復原力是一組特質的組合」的線性思考，重新理解「正向適應」中所包含的文化意涵。

本文嘗試從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中值得思考的幾個議題出發，先以復原力觀點分析原住民族兒少處境，繼而從幾個國外的案例來談何謂「文化復原力」，最後提出反思，討論兒少保護工作及處遇過程中有哪些重要的文化考量。

## 貳、兒少保護與原住民族兒少保護

兒少是權利的擁有者（rights holders），所有的兒少都有權利生活在安全的環境中。對兒少的不當對待極可能對其人格發展與存在價值造成損害，也會產生巨大的人力、社會與經濟代價（Hart, Lee & Wernham, 2011）。因此兒少保護是基於人權的實踐，而非僅止於福利的給予；兒

少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使所有兒少享有人格尊嚴與身心健全發展的絕對權利。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為保障與提升兒少權利提供了一套基本架構，其中公約中的第19條(Article 19)是為兒少保護的指南；而為了對公約中的第19條之執行提供進一步的指引與闡述，「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11年2月也提出「第13條一般性評議」。「第13條一般性評議」的中心主旨為「兒童有免於任何形式暴力之權利」(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freedom from all forms of violence)。

聯合國「第13條一般性評議」的內容中提到，各國政府雖然針對預防與回應兒少虐待發展了許多措施也做出努力，但現有之措施整體上並不夠。例如，大部分國家的法律架構中仍然沒有禁止一切形式之暴力侵害兒少的行為，法律的執法面也不甚適切，甚至在普遍的社會與文化態度中仍對於施予在兒少身上的暴力寬容以對。Hart等人(2011: 973-977)評析「第13條一般性評議」時指出，此條評議欲彰顯的精神包括：

- 一、兒少保護是一種人權觀點；
- 二、兒少保護是一種全面性的行動與全面性的介入；
- 三、在看到兒少虐待的盛行率與發生率的同時，也應著重兒少的正向發展；
- 四、清楚地界定與兒少的安全、健康、發

展與福祉有明確相關之人，或者負專業道德與文化責任之人，皆為兒少的照顧者；

五、兒少保護的措施重視兒少的參與和自主。

鄭麗珍(2015: 6)評析美國兒少保護的發展與精神內涵時也指出，隨著社會上重大兒少虐待事件的發生，並在兩波兒少保護運動的推波助瀾下，美國立法部門始積極訂定相關立法，要求行政部門負起保障兒少人身安全與身心發展等基本權力的責任。而我國在兒少保護的實務設計上，目前包含了一、二、三級的預防與介入，藉由各項社區／學校輔導工作、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服務、以及緊急保護和家外安置的介入，來降低兒少遭受不當對待的風險。我國兒少保護工作的執行及分工規劃上雖仍有許多待精進之處，不過從上述也可以得知，基於人權的實踐，保護兒少之安全需有全面性的介入與行動，以使兒少免於遭受虐待或疏忽。

從官方統計資料(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來看我國原住民族兒少受虐概況：2017年全國家內事件之受虐兒少人數共4,135人，一般身分受虐兒少有3,685人，約占89.12%，原住民族受虐兒少有450人，占了近11%；而原住民族兒少的人數大概占全體兒少人口數的3.7%左右(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顯見原住民族兒少保護議題確實是值得重視的議題。

然而，在吾人討論保障兒少人權的普世價值，並關注原住民族兒少受虐現象的同時，另一方面，與原住民族兒少福祉相關的研究指出，「規格化」的政策措施常導致更具地方性、區域性及脈絡敏銳度的服務無法施行（Fattore, Mason & Watson, 2007; Frønes, 2007）。Ivec, Braithwaite & Harris（2012）也指出，在原住民族兒少保護的行動實踐中，由於有權力的公部門對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缺乏興趣、保護決策過程中的不正義、以及缺乏溝通的做法，使得合作性的信任與行動難以建立。綜合整理中外研究，可發現原住民族兒少保護有下列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 一、族群的相對不利位置

臺灣原住民族集體之不利處境已在本土研究中被看見及討論，特別是原住民族兒少需面對貧窮、家庭解組、照顧資源缺乏、隔代教養、學習成就較低、部落認同危機等具挑戰性的議題（郭俊巖、黃明玉，2010；黃源協等，2008；詹宜璋，2010；鄭麗珍、李明政，2010），現有的研究提醒吾人，兼具人口弱勢特性與族群弱勢特性的原住民族兒少之處境需要持續地關注以茲改善。以台灣世界展望會（2015）的研究為例，其調查報告指出，原住民族家庭經濟收入與我國全體家庭平均收入的差距達2.16倍以上，原住民族單親／隔代教養家庭比率高於全國，其中隔

代教養家庭10年來成長近六成；再加上原住民族兒少的父母教育環境不佳，以致形成「親職弱勢」的情形，許多時候對於孩子的保護教養不是「不為也」而是「不能也」。林津如、黃薇靜（2010）的研究曾提出一個沈痛的疑問：「原住民族家庭真的比漢人家庭有問題嗎？」意在指陳原住民族的不利處境與相對劣勢，讓不同族群「拉近距離」（closing gap）的理想困難重重。

### 二、當兒少保護工作遇上「主流價值」

族群的困境有其歷史脈絡（Lalonde, 2006），當一個族群面臨文化傳承斷裂，被主流社會否定其存在價值時，「失竊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s）於焉造成。「失竊的世代」一詞指美、加、澳等國家過去在殖民主義及白人種族中心主義的思想下，對兒少保護採取同化政策，大量將疑似被不當對待的原住民族兒少帶離原生家庭、帶離其所屬社區／部落，送往集體安置的機構中成長，好強化白人文化的影響力（Ivec et al., 2012; 林津如、黃薇靜，2010）。由於對上述錯誤政策的反思，1978年美國通過的印地安兒童福利法案（The Indian Child Welfare Act of 1978）要求美國原住民族兒少在寄養照顧時，應盡可能地被安置在靠近其原生家庭和擴大家庭中，同時也希望寄養的家庭成員中至少有一位是來自於印地安大家庭

(Harris & Skyles, 2008; Swann & Sylvester, 2006)；1997年澳洲政府對造成「失竊的世代」公開道歉，試圖在「帶他們回家」(bringing them home)報告書中提出各項補救原則。各國雖對過往的傷害試圖彌補，但由於族群認同的喪失，以及前述所整理之集體不利處境，近年來，還是有高比例的原住民族兒少在進入保護體系後面臨「文化斷裂」的處遇安排（比如：被安置在非原住民族家庭之中）(Cornwall, 2004; 林津如、黃薇靜, 2010)。

### 三、雙重標籤：進入兒少保護處遇服務之原住民族家庭

在我國法令的規範下，家庭處遇服務兼具公權力干預與福利服務的性質，參與家庭處遇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往往因公權力對個人主體的權力支配(power over)而出現不合作的行為(王行, 2007; 徐雅嵐、廖美蓮, 2015; 鄭麗珍, 2015)。另從族群的角度來看，接受家庭處遇的原住民族家庭可能面臨「雙重標籤」的困境：第一個標籤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被貼上「施虐者」的標記，繼而引發其受責難、被誤解的負面情緒；第二個標籤則來自外界普遍認定原住民族的家庭功能不彰，導致整個族群被污名化。「案家」因上述而出現種種情緒反彈與抗拒行為，也經常令進行家庭處遇的社工員感到無能、無力與缺乏自我價值感。

## 參、以復原力觀點看原住民族兒少之處境

### 一、復原力的意涵與核心概念

在助人工作專業對病理模式(pathology-driven model)的深刻反省下，復原力(亦稱「韌力」)概念開始被運用在許多領域中，諸如：社會工作、教育心理、諮商輔導與醫療等專業。奠基於中外研究的累積，吾人對復原力的基本理解為「在逆境中仍能恢復功能並正向適應的動態歷程」。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指出復原力展現的條件(conditions)有二：首先為個體暴露在重大威脅或嚴峻的情境中；其次為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面臨重大逆境，仍能達到正向適應。這樣的概念強調兩種調適反應：一是儘管有威脅或危險存在，仍能維持正常發展；另一則是由創傷中復元(Staudinger, Marsiske & Baltes, 1993, 引自宋麗玉, 2005: 13)。Lalonde (2006)也提到，復原力的調適反應可以從「顯現」(presence)或「不顯現」(absence)兩種向度來觀察，意即個體在逆境中「顯現」正向調適，或者在逆境中「不顯現」負向結果，皆可被認定為復原力的展現形式。復原力概念的起源在於許多研究紛紛開始討論壓力源、風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之間的關連或其交互作用(Clauss-Ehlers & Weist, 2004)。

由此可知，討論復原力時有幾個核

心概念需要被進一步理解，包括：逆境（adversity）、風險因子（risk factor）、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以及交流互動（transaction）。以下就這幾個核心概念進一步討論：

### （一）何謂逆境

韋伯字典將逆境解釋為「造成嚴重或持續性傷害與困難的情境或事件」。白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與沈瓊桃（2010）整理中外研究，將逆境概分為下列幾種類型：第一為重大創傷事件的經驗，例如遭受災變事件或生活意外、遭到暴力攻擊或身心虐待。第二為個人長期的身心行為困境，例如：身心疾病或障礙、學業挫折或成就低落。第三為環境長期壓迫造成的困難，例如因種族、階級、貧困等導致的不利處境。可見逆境有可能是緊急短期的（如：親人離世、失業、離婚、受虐），也可能是經年累月的（如：種族不平等、長期身心障礙帶來的限制、受虐後的負面身心狀況）。

### （二）何謂復原力的風險因子

復原力的展現取決於風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間的抗衡過程（常欣怡、宋麗玉，2007）。Goldstein & Brooks（2013）指出，風險因子指特定的個人、群體或其所處情境中，那些可被預測的或會產生特定負面結果的指標（引自白倩如等人，

2014：31）；風險因子也可指從統計上來看會與負面結果相關連的變項，如：貧窮、受虐、疾病等（Lalonde, 2006）。Rak & Pattern（1996）從個人層面及環境面來談風險因子：在個人發展脈絡層面，包含了先天生理上的不利因素或疾病；而在環境條件層面上，則涉及貧窮、家庭內的暴力、藥物濫用與兒童的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等，這些對於個人心理與社會發展之不利條件均被定義為風險因子。Fraser, Richman, & Galinsky（1999）則從個體、生活事件與脈絡因素來區分風險因子的來源：個體的風險因子包括負面的人格特質與傾向；生活事件指會導致負向經驗的特定事件（如：父母過世）；脈絡因素則涉及不利的情境（如：不安全的社區），這些因素都是可能的「問題」來源。

國內研究指出，原住民族與本土其他族群相較，出現「三高、三低、三少」的現象：依賴人口比例高、失業率高、酗酒比例高；教育低、所得低、壽命低；福利資源少、醫療資源少、就業機會少（詹宜璋，2003、2011）。而這些都是原住民族生活脈絡中會導致其相對弱勢處境的風險因子。

### （三）何謂復原力的保護因子

由於風險因子太過聚焦於缺陷（weaknesses），忽視了個體的優勢與因應能力，特別是忽略了脈絡情境中的緩衝

(buffers) 因子 (Clauss-Ehlers & Weist, 2004)，因此有許多研究也試圖瞭解哪些保護因子與正向適應之間有所關連。Fraser, Richman & Galinsky (1999) 從補償性保護效果 (compensatory protective effects) 及緩衝性保護效果 (buffering protective effects) 來辨識保護因子：補償性保護因子指可以直接減少問題或傷害，或者直接改變負向結果的因素，諸如：個人的洞察力、良好的人際關係、擁有幽默感、具創意的行為……等；而緩衝性保護因子則指可以「調節」(moderate) 風險的狀況，主要是觀察保護因子在與風險交互作用後，其所產生的不同作用程度。Grotberg (1995) 歸納三類兒童的復原力保護因子，分別為「我有」(I have)、「我是」(I am)、「我能」(I can)：「我有」指的是能提升復原力的外在支持與資源；「我是」指的是個別化的、內在的優點；「我能」則是與外界互動的社會性技巧。

常欣怡、宋麗玉 (2007) 歸納國內多個研究，將復原力保護因子分為個人層次與外在支持層次：在個人層次上，包含正向自我價值、抒解情緒的能力、社交能力、獨立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同理心等特質；而外在支持層次則包括家庭的支持與期待、同儕支持等。沈瓊桃 (2010: 146-147) 的研究所發現之重要保護因子，如：個人的正向適應與正向自

我概念、高度的自我控制感、外在歸因、宗教信仰、未施暴家庭成員的照顧與保護、重要他人的支持、正向的學校社會經驗與人際關係、適時的社會資源介入能力……等，也都顯示復原力保護因子可分為個人層次與外在支持層次。白倩如等人 (2014) 則將復原力保護因子分為內在保護因子及外在保護因子兩大類：內在保護因子是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能力，包括勇氣、希望、問題解決能力；外在保護因子則指個人用來對抗逆境、困境和風險的各種社會支持與機會。

國內外研究中也曾提及原住民族群中某些共同的保護因子，例如Willeto (2007) 指出，美國原住民族重視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哲學觀和信仰體系基本上以「和諧」及「平衡」為基礎，這樣的基礎也包含維持日常生活中的正面與負面經驗之平衡和諧；Baskin (2006) 認為部落文化與部落知識是有活力且不斷變化的；劉鶴群 (2014) 指出，雖然原住民族兒少在「貧窮率」、「無法負擔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高於非原住民族兒少，但原住民族兒少在「與朋友的聯繫程度」、「自評健康」、「心理健康」等層面上與非原住民族兒少無顯著差異；石佳音 (2011) 也發現，原住民族青少年在心理幸福感的測量中與非原住民族青少年無顯著差異，且在「人際」與「一般心情」的分量表上，原住民族青少年顯著高於非原住民族青少年。

#### （四）復原力是一組在脈絡中隨著時間而動態發展的能力

復原力是動態發展並與環境相互交流的。不像特質取向（*trait-based*）觀點較著重在探討個人擁有（或缺乏）哪些心理特質與環境支持，互動過程觀點（*interactional process*）更重視多元因素與相關因素間的動態互動。事實上，多個中外研究的結果（白倩如，2012；沈瓊桃，2010；Egeland, Carlson, & Sroufe, 1993；Fraser et al., 1999；Luthar et al., 2000）皆發現，復原力會隨著時間與環境而有所變動，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能力或固定的特質，更非一種單向線性的關係。以沈瓊桃（2010）之研究為例，其以質性訪談探討雙重受暴青年如何從創傷中復原，並得以扭轉生命劣勢，研究發現復原力隨著個人的生命旅程與環境轉換交織地成長與變化，個人的內在力量與資源可能相互激發，進而形成一個正向的連鎖反應。由此可見復原力具備動態發展的特徵。

### 肆、從復原力到文化復原力：國外案例分享

上述討論整理了復原力之意涵與核心概念。Vernon（2004）指出，復原力相關研究歷經了三個重要進展：首先是研究視角的擴大，從僅探究個人內在的復原力

保護因子（如：個人的自尊、個人的正向情緒等），擴展到從個人、家庭、社會等更大層面去瞭解各種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存在（如：與同儕的正向關係、社區的參與機會等）。其次，復原力的重新界定，將其視為一個動態的歷程（*process*）或機制（*mechanism*），不再只是「特定特質加上特定因素」之簡單組合。第三個轉變則力主復原力觀點宜加入環境脈絡因素，認為個體不一定因擁有某些特質或能力就能「絕不受傷害」（*absolute invulnerability*），反而需要特別觀察個體是否受到脈絡所限制（*contextually circumscribed*）而無法展現優點與長處。事實上，當個體面對壓力時，環境因素可能是支持系統，提供緩衝的機會，但環境也很可能反過來為一種負面衝擊，例如某些兒童在學校的表現可能很「成功」（例如：學習動機良好、有好的友伴關係），然而在家中卻出現適應不良的情況（Clauss-Ehlers, 2004）。

此外，也開始有人反省復原力的研究發展是否過度圍繞著「白人樣本」（*White samples*），且正向心理的個人保護因子也多觀察自白人兒童，那麼復原力在非白人的文化脈絡下如何運作？另外，對復原力風險因子及保護因子的討論如何超越個人層次與家庭層次，去探究個體所經驗的社區和文化？也就是說，復原力概念如何應用到群體層次（*group level*）或文化層次（*cultural level*）中（Lalonde, 2006）？

又，當復原力納入文化多樣性之後，「成功適應」的意涵是否需要重新被理解？

由上可知，近年來針對復原力的研究更期待從多元與動態的觀點去探究個體如何與其所處的環境連結與互動，並觀察復原力是如何在個體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為回應復原力如何達到「在逆境中仍能正向適應並獲得發展」，研究也開始注意在不同的文化群體中復原力如何運作，因為對壓力的解讀、以及所選擇的因應行為會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Belgrave et al., (2000) 為非洲裔的美國青少年設計了一套重視文化與性別因子的復原力方案，介入的重點包括協助青少年連結與增加資源、協助青少年發展支持性的正向關係，而最重要的是，協助這些青少年認識他們生活所在之社區中的環境風險因子，如：毒品、犯罪、暴力；並協助她們重新認識非洲民族文化中的特色，如：重視靈性、和諧與集體責任，能敏銳地覺察情緒，採取可信賴的、平衡的人際取向，與過去、現在、未來共存之時間取向。研究發現，這些青少年以非洲民族為中心的（Africentric）的價值感、種族認同、對自我外表的接受度以及自我價值的提升都超過那些沒有參與方案的同儕，可見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培育需要回應「群體的文化」。

另外，Gonzalez & Padilla (1997) 針對墨西哥裔的美國中學生之研究發現，支

持性的學習環境、學校裡的歸屬感、以及文化中的家族主義可以預測這些中學生復原力。而Brodsky (1999) 的研究則指出，非洲裔的美國單親媽媽所認為的「良好適應」，意指在各種的風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中達到「平衡」(balance)，特別是在鄰里關係、親職、家庭、朋友、親密關係、個人活動與靈性達到平衡。上述的研究發現與Willeto (2007) 對美國原住民族的觀察頗為一致，其指出：美國原住民重視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哲學觀和信仰體系基本上以「和諧」及「平衡」為基礎，這樣的基礎也包含維持日常生活中的正面與負面經驗之平衡和諧。

除此之外，Lalonde (2006) 追蹤加拿大原住民族兒少的自殺率與被家外安置的狀況後，明確指出「文化」是復原力中的關鍵要素，它可以是保護因子也可能是風險因子。當一個原住民族社區重視他們的文化遺產，對他們集體的未來更有掌控感時，便為兒少因應未來的挑戰提供了保護與支持，也提升了整個社區的適應能力。在這當中，個人連續感 (personal continuity) 與文化連續感 (cultural continuity) 扮演重要角色；所謂個人連續感指原住民族個體有能力「持續認識我是誰」(being who I am)，而文化連續感則指原住民族群體有能力「持續認識我們是誰」(being who we are)。當原住民族失去個人連續感時，會將個人

至於風險之中；同樣地，當失去文化連續感時，則將整個文化群體置於風險之中。Beel, Wallace, Webster, Nguyen, Tait, Macleod, & Mellish (2015) 提出相同的觀點，認為文化的實踐協助偏鄉地區形成存在感 (come into being)，因此可成為復原力的來源。

談到文化的重要性，Cornwall (2004) 以進入保護體系的紐西蘭原住民族兒少為例指出，當兒少進入保護體系後，後續的家外安置或處遇等安排，都造成許多原住民族兒少與其原有的文化斷裂；殊不知，文化斷裂就如同貧窮一樣，是造成原住民族兒少進入保護體系的主因。而讓原住民族兒少在一個文化斷裂的情境中被「保護處遇」，如何談的上穩定維持兒少的統整性自我認同呢？Lalonde (2006) 也質疑，具備文化連續性 (cultural continuity) 的加拿大第一民族原住民 (First Nations) 被證實能夠生活的比較健康，然而政府的政策（諸如：強迫社區搬遷、兒少被帶離自己的部落）卻總是迫使第一民族卻必須在政策與文化連續性之間掙扎。

## 伍、對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的省思～代結語

在上述的發展脈絡下，一種試圖從文化層面來理解復原力 (a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 resilience) 的觀點應運而

生。前述提及，復原力被認為是個人、家庭、社區以及更大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下之動態過程。「文化復原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協助個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良好適應與和諧融洽的過程」(Clauss-Ehlers, 2004)。Clauss-Ehlers (2004) 指出，這是一種「聚焦於文化的復原力適應」之概念，在納入了文化與多樣性 (diversity) 之後，可跳脫以往「復原力是一組特質的組合」的線性思考，更強調個人與較為鉅視層面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互動。換言之，認識個體如何與其社會文化脈絡互動，可以協助其提升復原力；而另一方面，當個體陷入逆境時，吾人也需關心此逆境是否為結構性的不利生態。文化復原力的觀點與生態系統交流過程 (ecosystematic transactional process) 復原力觀點的主張相近，只是文化復原力更強調「不同的文化群體可能具備不同的因應能力與經驗不同的復原歷程」，除了具體指出不同文化群體的復原力展現歷程不一定相同外，也認為需從歷史的脈絡中理解不同群體在當代所面臨的困境。

兒少保護工作與處遇過程中有重要的文化考量，舉例來說，對澳洲原住民族的文化而言，將孩子寄養在陌生人家中等於是「偷」了他們的小孩 (Yardley, Mason, & Watson, 2009)。因此，進行保護或處

遇時下列幾點是格外值得留意的：

- 一、首先，社工員應敏察文化差異確實存在，也應覺察自己的限制（不可能全然熟悉不同文化的家庭），因此可鼓勵家庭提出文化議題以澄清誤解。服務時，社工員盡可能使用家庭最熟悉語言，若無法使用家庭熟悉的語言，則應尋求翻譯的協助。
- 二、其次，社工員應熟悉所服務族群的態度傳統、規則及價值觀。Spence（2004）指出，兒少保護工作者在進行處遇前，應該對兒少本身、兒少的家庭以及社區有所了解，且需對於原住民的文化有所尊重；若需家外安置，則應以延續兒少的文化之前提來進行，他並強調，這個準則「是一個必須堅持的政策」。
- 三、每個家庭都有權讓兒少保護體系瞭解自己，知道兒少保護服務的所有過程（鄭麗珍編譯，2011：351）。英國的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也指出，每個家庭在接受處遇的過程中，都應該被公平、尊重、無歧視地對待；他們有權力知道自己如

何被評估、如何被期待、將獲得哪些支持，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權利瞭解自己「為什麼需要接受評估」（the reasons for this assessment）。

特別是兒少保護社工員在與原住民族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工作時，更應理解其雙重標籤的困境，第一個標籤來自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被貼上「施虐者」的記號，繼而引發其受責難、被誤解的負面情緒；第二個標籤則來自外界常認為原住民族家庭「功能不彰」，導致整個族群被污名化。

- 四、最後，為避免再度掉入「特質陷阱」（trait trap）中，吾人需敏察，從某一原住民族社區／部落所粹取出之復原力「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是否能原封不動地輸出（export）至另一個原住民族社區／部落中（Lalonde, 2006）？

（本文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文化復原力、復原力、原住民族兒少保護

## 參考文獻

- 王行（2007）。〈七年之想：輔導「施暴者」的雜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7。頁19-36。
- 台灣世界展望會（2015）。《原住民服務需求調查報告》。臺北：台灣世界展望會。
- 白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復原力任務中心社會工作》。臺北：洪葉。

- 石佳音（2011）。《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青少年情緒情緒智能與心理幸福感之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宋麗玉（2005）。〈精神障礙者之復健與復元：一個積極正向的觀點〉，《中華心理衛生學刊》4，頁1-29。
- 沈瓊桃（2010）。〈暴力的童年、堅韌的青年：目睹婚暴暨受虐青年復原力之探討〉，《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頁115-160。
- 林津如、黃薇靜（2010）。〈失竊的世代？漢人家庭意識形態符碼與原住民族兒童保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7，頁59-96。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106年人口資料統計年報〉。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09FED5C67208C8A3&DID=2D9680BFECBE80B68D641C3A9D2F2E43>）。2019/11/24作者讀取。
- 徐雅嵐、廖美蓮（2015）。〈兒童少年保護的個案工作流程〉，鄭麗珍編，《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實務手冊》。臺北：巨流。頁54-76。
- 常欣怡、宋麗玉（2007）。〈青少年復原力概念與相關研究之探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7，頁171-192。
- 郭俊巖、黃明玉（2010）。〈原住民在都市謀生的艱辛歷程之研究：以三個受助個案為例〉，《弘光學報》59，頁60-77。
- 黃源協、莊正中、童伊迪、侯建州、陳怡雯、陳美淑（2008）。《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之規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詹宜璋（2003）。〈原住民各類人口群潛在福利需求之探討〉，《社會發展研究學刊》5，頁93-113。
- 詹宜璋（2010）。〈原住民之族群不利地位認知與歸因類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4(2)。頁195-214。
- 詹宜璋（2011）。〈原住民對族群社會福利的經驗認知與發展期待〉，《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4(4)。頁85-104。
- 劉鶴群（2014）。〈原住民族兒童及少年社會排除〉，黃源協編，《部落、家庭與照顧：原住民族生活經驗》。臺北：雙葉。頁192-224。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兒童少年保護—受虐人數〉。衛生福利部統計處（<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4.html>）。2019/11/24作者讀取。
- 鄭麗珍（2015）。〈兒童少年保護制度的歷史發展〉，鄭麗珍編，《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實務手冊》。臺北：巨流。頁2-12。
- 鄭麗珍編譯（2011）。《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原作者：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臺北：洪葉。2004。

- 鄭麗珍、李明政（2010）。〈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評估〉，黃樹民、章英華編，  
《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181-258
- Baskin, C. (2006). *Aboriginal world views as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1.uwindsor.ca/criticalsocialwork/aboriginal-world-views-as-challenges-and-possibilities-in-social-work-education>
- Beel, D. E., Wallace, C. D., Webster, G., Nguyen, H., Tait, E., Macleod, M., & Mellish, C. (2015). Cultural resilience: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role of volunteer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43016715000479>
- Belgrave, F. Z., Chase-Vaughn, G., Gray, F., Addison, J. D., & Cherry, V. R. (2000).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ulture- and gender-specific intervention for increasing resiliency among African American preadolescent females.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6(2), 133-147.
- Brodsky, A.E. (1999). 'MAKING IT': The components and process of resilience among urban, African-American, single mot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9(2), 148-160.
- Clauss-Ehlers, C. S. (2004). Re-inventing resilience: A model of 'cultural-focused resilient adaption'. In C. S. Clauss-Ehlers, & M. D. Weist eds., *Community planning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27-41.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 Clauss-Ehlers, C. S., & Weist, M. D. (2004). Advancing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planning to promote resilience in youth from diverse communities. In C. S. Clauss-Ehlers, & M. D. Weist eds., *Community planning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3-11.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 Cornwall, J. (2004). Promoting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receiving care conference.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23, 200-206.
- Egeland, B., Carlson, E., & Sroufe, L. A. (1993). Resilience as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5(4), 517-528.
- Fattore, T., Mason, J., & Watson, E. (2007). Children's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ir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0(1), 5-29.
- Fraser, M. W., Richman, J. M., & Galinsky, M. J. (1999). Risk, protection, and resilience: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31-143.
- Frønes, I., (2007). Theorizing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3(1), 5-23.
- Gonzalez, R., & Padilla, A. M. (1997). The academic resilience of Mexic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9(3), 301-317.
- Groberg, E. (1995). *A guide to promot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spirit*. Hague, Netherlands: The Bernard van Leer Foundation.

- Harris, M. S., & Skyles, A. (2008). Kinship Care for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Disproportionate and Disadvantageou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1012-1030.
- Hart, S. N., Lee, Y., & Wernham, M. (2011). A new age for child protection – General comment 13: Why it is important, how it was constructed, and what it intend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12), 970-978.
- Ivec, M., Braithwaite, V., & Harris, N. (2012). ‘Resetting the relationship’ in Indigenous child protection: Public hope and private reality. *Law & Policy*, 34(1), 80-103.
- Lalonde, C. E. (2006).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R. J. Flynn, P. Dudding, & J. G. Barber eds., *Promoting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young people receiving car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pp. 52-71. Ottawa, Canad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 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 Rak, C. F. & Patterson (1996). Promoting resilience in at-risk childr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4(4), 368-373.
- Swann, C. A. & Sylvester, M. S. (2006). Does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serve the neediest kinship care famili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8, 1213-1228.
- Vernon, R. F.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resilience: From early beginning to current constructions. In C. S. Clauss-Ehlers, & M. D. Weist eds., *Community planning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13-26.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 Willeto, A. A. A. (2007). Native American kids: American Indian children’s well-being indicators for the nation and two stat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3(1), 149-176.